

[文章编号]1004—5856(2017)01—0024—05

20世纪4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 消费不足论研究述评

——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

夏玉凡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摘要]保罗·阿特维尔在其著作《60年代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个知识社会学视角》中梳理了斯维奇、巴兰、吉尔曼和佩罗等人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消费不足论的贡献,并对他们的相关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阿特维尔通过对北美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的论述,意在向人们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美国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研究阵地的转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新路径,凸显了现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新趋势。

[关键词]经济危机;美国;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斯维奇;巴兰;吉尔曼;佩罗

[中图分类号]F091;A8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1.007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即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以及研究阵地的转移。从研究范式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实现了从对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研究向对资本主义停滞论研究的转换,从逻辑验证研究向经验数据研究的转变。从研究阵地来说,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欧洲大陆逐渐转向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同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成熟,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特点和变化,这些变化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提出了理论挑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经历了发展的低潮后,在美国焕发了新的活力,以斯维奇、吉尔曼、巴兰和佩罗为代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牢牢占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统治地位。

一、斯维奇:美国消费不足论的建构

阿特维尔首先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阶段消费不足论的发展。他认为,北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第一次全面而详尽的分析是斯维奇做出的,他在194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不仅对马克思主义^①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回顾,而且为建立独特类型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整本书涉及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但斯维奇关于危机理论的讨论集中在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他把经济危机分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实现的危机两种类型,从表面上看,这种区分方法似乎是不必要的,但斯维奇认为,欧洲大陆上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折衷主义的遮蔽依旧存在,^{[1] P172}即存在两种与行动逻辑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危机理论。阿特维尔认

[收稿日期]2016-05-13

[作者简介]夏玉凡(1991-),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为,斯维奇对利润率下降趋势争论的观点十分重要,尽管他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如他认为从来没有考虑到要否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其根本的重要性,他表明当时规律的一般阐述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认为反作用趋势的存在会逐渐削弱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也没有理由相信利润率必然会下降。这就使得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长期影响和意义变得难以决定。在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之后,斯维奇把研究视角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现实的危机。并对杜冈的比例失调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杜冈的比例失调论处于次要地位,从而将研究视角转向消费不足论。

斯维奇认为,消费不足论的关键在于限制工人的工资以及消费,通过剩余价值再投资的无限循环造成了不断扩大再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斯维奇着重分析了两种危机:一种是过度的生产能力造成的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下降以及产品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生产能力被闲置,从而导致一种停滞的危机而不是一种周期性的危机。这种消费不足的危机能否发生,取决于抵消和消费不足的反趋势的大小。斯维奇列出两种抵消消费不足类型的反趋势:一种是新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的提高,另一种是新的需求来源会限制工人消费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包括人口增长、非生产性消费和国家支出。首先,他考察了人口增长对消费不足抵消趋势的影响。这种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果,尤其是在新兴国家中,农村人口可以增加劳动力并且出生率也高。相反,在工业化成熟的国家,工人阶级往往会保持一个人口较少的情况。在保持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下,这种反趋势会逐渐消失。借用卢森堡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实际上意味着增加新的消费人群。其次,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和国家支出在抵消工人受到消费限制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斯维奇把商业部门以及从事服务业的工人归入到非生产性消费的范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非生产性工人可以得到其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是从可用于投资的剩余价值中得来的。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部分一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抵消消费不足的趋势:第一,由于非生产性工人需要购买商品,因而把货币从投资中转移出来,从而阻

止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第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于投资的从剩余中流出的国家支出的资金转变为消费的剩余资金,这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之为一种消费不足的表现。所以,斯维奇把国家支出的行为看作是提供减弱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强有力的手段。

之后,斯维奇对国家职能问题进行了讨论。阿特维尔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如布洛克、鲍威尔等人着重讨论了国家职能问题。从总体来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垄断企业和国家视为比例失调的潜在的管理者,与斯维奇相比,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计划经济产出的部分。而斯维奇则在消费不足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垄断企业和帝国主义的核心职能。阿特维尔认为,尽管都是分析核心的职能,但斯维奇认为这些方面比不均衡规划更具有相关性。^{[1](P174)}他首先假定这些职能能够比竞争性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由于他们把收入从消费领域转移到了投资领域,因此,垄断的产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的情况。在价格竞争的环境下,垄断者尝试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其他生产者的产品,因而他们花费大量的货币在广告、营销和运送等职能上,从而创造出大量的广告和销售员。这些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生产性工人,却提供了强有力的额外消费需求源泉。对于国家职能来说,如果国家把收入从富人阶级向穷人阶级转移,那么国家以资本积累为代价实现垄断阶级的消费。但是如果国家由资产阶级主导,那么其财富转移的目标无非是把社会购买能力从一个消费群体向另一个消费群体转移,而不是通过损害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通过对资本家收税、减缓投资来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此外,国家如果遵循着资本利益、投资发展、生产能力的提高的方向发展,那么消费不足或者经济停滞的情况就开始出现。阿特维尔认为,斯维奇是第一批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进行理论上争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的著作作为之后几十年内北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下了基调,实现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欧洲大陆以崩溃论为主的马克思经济危机转向以消费不足为核心的北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因此,北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不是利润率下降问题而是消费不

足问题。^{[1] (P176)} 除此之外,斯维奇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和垄断组织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每一个都在平衡消费和投资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平衡的思想继续支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斯维奇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把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利润率下降趋势转向消费不足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一些英国和美国年轻的左翼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逻辑并不会导致一个决定性的结果。^{[1] (P176)} 因此,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开始从逻辑论证向经验实证研究的范式转化。

二、吉尔曼: 剩余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转化”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吉尔曼于1957年在其著作《利润率下降》一书中第一次实现了这一范式的转化。他在回顾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后,试图通过统计数据来检验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即资本有机构成真的会上升? 利润率真的会下降? 他通过统计美国近七十年工业发展数据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统计数据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预期: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有机构成从原来的上升状态逐渐变得平缓,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都出现了上升的情况,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相反。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吉尔曼认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性,即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形成时期,但是并不适用于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2] (P59)} 吉尔曼同斯维奇一样,希望通过垄断资本主义寻找历史变化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技术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要求大量的资本投入,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机器设备质量的提升而不是数量和成本的增加。所以这就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提高。除此之外,吉尔曼关注到垄断资本主义第二个重要的特征: 实现成本的提高。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涉及到销售努力和其花费的问题。根据吉尔曼的观点,这些实现的成本将会是导致毁灭性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垄断资本家扭转了利润率下降的趋

势,并且将日益增加的利润重新投资到再生产中,那么与需求相比就会造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过剩。然而,实现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利润的获得,提高了非生产性需求,抑制了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在吉尔曼看来,垄断平衡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生产超过消费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是暂时的,资本家的利益在于以消费为代价,然而消费的利益正好与之相反。因此,垄断资本主义则会呈现出消费和利润提高之间拉锯战的情景。^{[1] (P177)}

三、巴兰与斯维奇: 经济剩余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危机

1966年,斯维奇和巴兰出版了著作《垄断资本》,他们首先分析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积累问题的技术性分析,其次,在垄断资本主义和非理性条件下对低生活质量犀利的批判,其核心在于巨型公司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载体。巴兰和斯维奇使用“垄断资本”这个术语意在表明各个领域的巨型公司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不同于传统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不会沉溺于降价竞争中,垄断者允许通过价格领导机制使得价格在接近于垄断价格附近浮动。对于寡头垄断者来说,由于产品的高成本可以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利润的提升,而不是利润率的下降。阿特维尔认为,这种剩余价值的提升引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剩余价值如何进行投资?^{[1] (P178)} 如果剩余价值被投资到新的领域,那么生产能力将会超过消费者的需求,导致一种生产停滞的情况。如果剩余价值没有被投资并且被资本家以金钱的形式储存起来,^② 投资品需求的急剧缩减再次导致消费不足和经济停滞的情况出现,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大量的资本投资和消费不足的长期趋势。

阿特维尔认为,斯维奇和巴兰从几个具有潜在吸收剩余的领域中为过剩的经济剩余寻找出路。首先,他指出海外投资已经不再属于这些潜在吸收的手段之一,其原因在于短期内外流盈余的扭转,使得海外利润重新回到国内,剩余不仅没有被吸收,反而变得更多。其次,产品销售也不能影响到总需求的提高。当垄断组织不再采取使用价格竞争的手段时,垄断者为了把消费者需求从其他垄断者的产品中吸引过来,一般都采取了广告的竞争手段。大量非生

产性工人被雇佣到广告行业中,从事对新产品、新包装的设计以及投资项目的规划。阿特维尔认为,巴兰和斯维奇讨论的特别适合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时期。按照资本发展的逻辑,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过剩的资本希望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而消费者需求受到限制。而解决的出路是通过大量非生产性的努力来实现,即增加总需求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无用”的领域,例如武器、奢侈品以及销售打开新的领域。阿特维尔总结道“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终于追赶上了战后美国消费主义的步伐。”^{[1] (P178)}

四、佩罗: 价值规律下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阿特维尔考察了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维克多·佩罗。作为一名正统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佩罗并不排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不同于斯维奇和巴兰,佩罗在其著作《不稳定经济: 1945年后美国经济繁荣与衰退》中采用了传统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阿特维尔认为,佩罗的消费不足分析甚至对正统的危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佩罗在其著作中关注的是美国周期性的危机,这与巴兰和斯维奇二人关注的长期停滞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目的在于呈现出商业周期仍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有的表现。阿特维尔认为,佩罗的这个观点看似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观点,但是他意在提醒人们,在美国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看起来已经消失了。佩罗的目的就在于证明直到1970年之前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表现的美国,在面对急剧扩张和相对缓和的衰退期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其次,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商业周期中,佩罗不再强调利润率下降趋势,而是将视野转向消费停滞与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佩罗根据美国工业统计数据认为剩余价值率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佩罗发现,在整个战后期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劳动生产份额不断下降,这一发现预测了美国战后消费不足的问题,证明了额外的资本剩余在限制消费力面前是毫无用处的。最后,同斯维奇、巴兰和吉尔曼一样,佩罗讨论了抵消消费不足的趋势。根据佩罗统计的数据,获得薪水官员

和销售人员的范围扩大并没有消除消费不足和剩余过剩问题,^{[3] (P204)}因此,他把抵消消费不足趋势的力量转移到国家支出上。与军事力量相同,信用、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或许可以减轻消费不足对美国的影响。佩罗认为,最好的尝试就是评价各种抵消消费不足趋势的力量,即被政治和其他趋势管理的方法,但他认为这些管理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佩罗得出结论:类似1929-1932年的危机不会再发生,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越来越大,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大很多。^{[3] (P208)}

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北美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的研究,阿特维尔认为,这些学者既不是合作者,也不属于某个学术流派,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关注过彼此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还保持着不同的政治地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段时间,消费不足论在学术界处于无人挑战的霸主地位。他们都通过统计数据表明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率不断增长,因此,学术界把这个证据作为战后危机理论中消费不足论者进一步关于国家职能的活动以及非生产性工人扩张的观点的佐证。此外,阿特维尔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消费不足论者认为,消费需求的不足和停滞的闲置生产能力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不足论的抵触。一般来说,战后资本主义的停滞以及国家可以抵消这种停滞的趋势是被广泛接受的,并且主要通过军事支出的方式来实现,而坚持这些观点的学者往往被称为“顽固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阿特维尔认为,提出这样的标签的人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十分明显的。在考茨基1902年的著作以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都对马克思消费不足论进行了完整的阐述。同时,这样激发了卡莱茨基的研究,他发展了有效需求的理论,这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时间还早了几年。虽然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不足论与马克思的消费不足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是为了把凯恩斯的理论应用于削弱商业周期的分析中,而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干预视为一种暂时性的、有限的抵消趋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凯恩斯主义者把国家赤字和预算赤字用来加剧其他类型的经济矛盾作为代价而推迟危机。因此,阿特维

尔总结道“新右派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平衡预算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也接受这样的观点。”^[1](P181)]

五、阿特维尔研究北美消费不足论的评介

阿特维尔通过对北美 20 世纪 40 年代北美消费不足论的梳理和研究,呈现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复兴路径和研究方向。首先,阿特维尔的梳理呈现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阵地的转移,在运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阿特维尔指出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者往往把危机理论同革命理论联系起来,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并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生在欧洲大陆,使得其呈现出多元的理论风格。这也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生活在欧洲大陆,并且与欧洲大陆是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地有一定的关系。同时,早期的危机理论研究者大多数生活漂泊不定,常年处于革命斗争的生活状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活动逐渐停滞,危机理论的研究在欧洲大陆也逐渐淡化。一些理论家从欧洲大陆前往美国避难,同时也将理论研究的阵地转移到较为和平安全的美国,并且一些理论者成为大学教授,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危机理论的研究。因此,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到当代,美国就成为

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重镇。其次,阿特维尔认为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竞争以期获得社会的认同,从而导致范式的冲突。与早期不同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摒弃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常见的用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在当代左翼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很难看到。与之相对应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一些词汇,如生产方式、资本的有机构成等词汇,以一种更加小心的方式被定义。类似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等人具有论战式和攻击性的批判性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具有学术规范,更具有抽象意义的语言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从传统的逻辑论证转向经验数据和逻辑论证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再表达。

注释:

①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集中在欧洲。

②凯恩斯称之为“流动性偏好”。

[参 考 文 献]

- [1] Paul A. Attewell,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 Gillman J.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arx's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wentieth - century Capitalism* [M]. London: D. Dobson, 1957.
- [3] Victor Perlo. *The Unstable Economy: Booms and Rece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3.

责任编辑:李新红

Research Review on 1940s American Underconsump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ociology

XIA Yu-f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Paul Attwell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made by Swiji, Ballan, Gilman and Perot in “Post 1960s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 Knowledge Sociology Perspective”. Attwell tends to show that Marxism economic crisis theory realizes a transition from research paradigm to domain through analyzing the North America Marxism underconsumptionism, which opens a new rout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 crisis theory and highlights the new trend of this theory.

Key words: economic crisis; America; Marxism; underconsumptionism; Swiji; Ballan; Gilman; Perot